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思想在西方影响之前的中心人物，本书分内篇外篇，内篇旨在分析戴东原与章实斋的思想交涉及与乾、嘉考证学风的关系，借以展示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外篇则是与两人相关的杂论，或是比较史学的，或是对思想史的宏观的概览。

作者虽持多元论，但在本书中主要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角度分析。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清代的考据学风气或者说“道问学”是在宋明理学“尊德性”道路走到尽头之后的自然转向。笔者并非不注重史料的考据，但由于并无相关的研究，暂且肯定作者的结论，接下来主要是对思想史本身进行探讨和提出疑问。

一、外缘影响

作者并没有直接对清代学术的“外缘影响”做出深入的分析。就笔者看来，“外缘影响”与“内在理路”实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正是宋代理学家们从“内圣”上重建社会秩序尝试“回向三代”的努力并不成功，由内部造就了清代的外部政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明理学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导向了清代“道问学”的风气。

二、宇宙论问题

钱宾四讲朱、陆异同，视朱子既有宇宙论，又有心性论，而子静则只讲心性论。而作者在谈及朱子时，并未论及其宇宙论的部分，应当说似有疏漏不全之处。宋代理学的“宇宙论”的部分，正是与“客观认知”息息相关，比照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对宇宙论更进一步的认知也是近代化发展的表现。但由于宇宙论的问题既不是孔、孟及儒家传统经书的关注点，理学家们讲得虽不好却也没留下可供继续发展的空间，儒家宇宙论的问题在宋代之后便不见到有新的重要性突破，明代的理学家们还会就宋儒所创设的“理”“气”问题做些调整、修改，到来清代学术，则不见相关的讨论。

三、朱陆异同

宋明理学的主要一端，如作者所分析的，是在“尊德性”一边。这一解释的最大问题，仍是在难以完全将程、朱与陆、王的差异讲明白，王阳明的学说固然是在“尊德性”的方向上发挥到极点，但王阳明治学的背景，首先是朱子学的路径或至少是官方主导下的程朱理学陷入僵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将程朱“理学”与所谓陆王“心学”的差异理清，不然不能很好的解释阳明心学所表现出的对朱子学的驳斥、反动。本书中作者在这方面的论述，就笔者所见，尚还不够。

在“尊德性”的基础上，朱熹已有意识将道德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这正是清代考据的伏流所在，清代一般治汉学考证的学者由于只持考证为衡量学术的准绳，拒斥朱子较好理解，戴东原已有意识重义理，单只提出其因觉程朱在“敬”的方面讲得多，“学”的方面太少，似还不够说尽戴东原对程朱的批评。

四、再谈“尊德性”

进一步分析，笔者判断，将“尊德性”作为统摄宋儒思想的主题还是不太妥当。陆王心学比程朱学要更看重“尊德性”，相较之下，后者两者兼重。或许应该说，在清代学者的眼中，宋明儒家重“尊德性”，是因为其创造性的思想成果实际上并不成功，不被清代的学者所认可。于是他们认为其原因即在其未能够对儒家的经典有正确、深入的认识。暂且不论这种类“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取向是否正确，可以确定的是，着并不能证明宋儒们不重视“道问学”或一边倒侧重于“尊德性”，只是宋明理学并未将儒学或者说中国的文化带入不断发展的思想史中的一个可持续性的新阶段，只是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联系前面所说的“外缘影响”的问题，清代正是学术、思想千年来最不自由，创造性最受抑制，社会的氛围最为凝滞的时期，清代的学者们无力再从宋儒们所站立的起点，超另一个方向做创造性的工作。于是乎，只好转过头来，将儒家原来的肯定经典、重视传统与传承的特征发展到极致，以为所有的道理实际上都在古籍中为先圣所言了。用“道问学”批判“尊德性”，实际上陷入了另一个极点。但总的来说，在思想本身的发展上或许清代的考据派们未有什么大的贡献，但方法论及技术上的耕耘，至少没有使学术的发展完完全全停滞下来，成果还是有其价值所在的。